

## 关于《北美行》和文化学人

钟文庆

先说说杂志的估值。4年前有个公司想投资我们，他们的CFO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读书的时候经常看《北美行》，那时候他觉得休斯顿是中国文化的绿洲。最后投决会上，他们的董事长尹总问这个公司靠谱吗？CFO说能办出《北美行》杂志的人一定靠谱。尹总说那就投1个亿吧。当时我们市值是投前85亿元，两年后，我们在科创板上市，市值320亿，尹总把股票卖了，税后净赚了2个亿，给了CFO一大笔奖金，CFO请我吃了顿饭，上了好几道硬菜。尹总是谁，可以百度尽调一下，也是留美的，德州的，最有名的是他70多岁有个2岁的儿子。

各种原因我对休斯顿的记忆是碎片化的。记得第一次从何志工和昌增益那儿看到的《北美行》杂志的时候吃了一惊。我以前在上海交大读过一年，那时交大有本学生杂志叫《新上院》，主要是理工科学生写的文章，很真很纯，我很喜欢，这也是我当年弃理从文的原因之一。当然后来学了文科后被训练成只会用脑子不会用心写东西了，这是后话。《北美行》跟《新上院》很相似，我也就很喜欢。

除了文章外，最主要的是人，特别是现在群里的这些文化学人。说起休斯顿的生活，我的头脑里的画面是：

1. 昌增益的 Station Wagon。就是李经口里的“大破车”。我曾经非常羡慕他有那样大的车，以前从来没有见过，像梦想中浪迹天涯的少年侠客的坐骑。后来我在上海时也想弄一辆，结果被告知我只有权使用 Volvo 牌子的车子，那时我不幸正在沃尔沃公司工作。谁知道几年后，沃尔沃就被吉利收购了。
2. 何志工的围棋。印象里是在一家中餐馆里，饭后他跟华志安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好纵横格子下围棋。有照片为证。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的人是有大智慧的，知道往昔的人一般都会知道未来的。当时我就在想，眼前这个创办文化学社的人将来一定会横刀勒马纵横天下的。
3. 柳飞舟的名字。学社里论下棋，除了何志工外可能更厉害的是柳飞舟。飞舟学医的，悬壶济世。我第一次见到飞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他的名字好，冥冥之中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直到我年过半百，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名片上赫然印着“飞舟”二字。我们在上海临港工厂的地址正是位于飞舟路上，绕了几十年的歧路终于又碰头了。
4. 徐海明的金融。我对金融的第一印象是从徐海明那儿来的，当时他在 Rice 读经济还是金融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居然有人不读物理而读别的，这让我很意外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聪明人才配读物理，而物理是能改变世界的。直到前几天，公司让我去组一只基金，我突然就想起海明，原来金融能买下世界。
5. 许赤婴的成语。许赤婴的文章风格就是典型的《新上院》，我一直很喜欢。后来我回国后，我们两个还一起在一本国内杂志上开过专栏，当时挺受欢迎，续了好几期。那时已经不太流行读者来信了，如果是的话，说不定我们两个可以收一麻袋的来信。许赤婴潜心研究成语典故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女儿出口就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成语有多重要，

应了维特根斯坦的话，语言界定世界。

6. 范瑞平的哲学。我当年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曾经跟一位同样学哲学的校友在 1988 年的一个暑假里骑车去了趟海南岛，他后来成了上海首富，带着一群浙商主持过黄帝陵的祭天仪式。不信的话也可以百度一下。这就是我对范瑞平的印象，我一直觉得他的雄辩口才和犀利思想总有一天会统治世界的，如果世界听话的话。

7. 曾令同的父亲。曾令同的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老人，记得有一次一起出游，好像是去 Galveston 钓螃蟹，我对他老人家印象很深。他精力很好，好奇心很强，像个少年。到了今天，看看我自己，我好像对一切都不好奇，都很少感动。今天下午坐在冰冷的会议室里跟人谈判，抽空刷到大家回忆休斯顿的活动来，心里才感到些温暖。

8. 王胜组织的活动。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父亲钓的鲤鱼，而是甲鱼。那好像是在他的家里吃到的，而美国人居然不吃甲鱼。当年能够酒足饭饱就是幸福生活，多幸福啊。至于那次的 Picnic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几十个人想挤进一辆小巴士里，想申请吉尼斯纪录。还有一年圣诞节过平安夜，不记得是在王胜家里还是徐志华家里，只记得离开时夜色中满院子盛开着圣诞灯珠，粉粉的，像早春的樱花一样，祝愿好人一生平安。

9. 还有一些逝去的朋友，我印象里老路的车子是带黄金轮毂的，程炼那时候有个台湾女生死活要跟他，明星壮硕得像三项铁人，而周老师是书里才能得见的谦谦君子。

还有很多人很多事，毕竟那里有 7 年最美好的岁月。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，也不知该怎么结尾。我还是照抄一遍顾丽华的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吧：

“在休士顿的日子里，我们互相学习，互相陪伴。我们逐渐成长，相继毕业，然后各奔东西。我们按着我们想要的方式选择了自己的路。我们分手，但回望时，想到过去的朋友和老时光，依旧温暖。”

索性把最后一段也抄上，反正我也是这个意思：

“谢谢你们。有你们真好！”

2025.10.14 于日本东京